

东吴名家·宋炳辉

## 读宋心解

——为老友所写的一组阅读笔记

张 辉

—

这篇“阅读笔记”，至少开了四次头。甚至一度以为已经“完成”了，又决定彻底推倒重来。这多少有点“异常”。在我个人的“写作史”上，只有几年前为业师乐黛云先生的《学术叙事》写作“前言”时，遇到过同样“困难”，那篇区区短文，竟然前后耗时一年零八个月。

说异常，是因为，我几乎阅读过炳辉所有的代表性文章，有的甚至不止一遍，自以为对他的很多想法“了然于心”。也因为，多年来我们有过一次又一次的默契合作，从为复旦大学出版社联合主编 24 卷“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术文库”，到一起策划并主持“中国比较文学文库”（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中国比较文学云讲堂”（有赖大连外国语大学的支持）等长期项目，每一回每一遭，都是一拍即合、遥相呼应，从来没有过“难产”的时候。

但这一次，真的要写写我对炳辉的“阅读”印象，却一时不知道从何说起，不知道怎样才能准确“画出”一个我心目中真正的炳辉。

直到前不久，我获赠一幅书法家杨辛先生写于他 94 岁高龄时的作品，内容是陌生化的“深水静流”（而非通常所说的“静水流深”），

我才真的找到了“感觉”，觉得终于可以改定这篇小小的“读宋散论”了。是的，炳辉的文章，像他的为人一样，猛一看来，永远是安静的、似乎没有波澜的，但在深处，他却每每能让我体会到里尔克那句诗“我认出了风暴而激动如大海”（陈敬容译）的意蕴。永远平实、朴素，永远去雕饰、近自然、有本色，但永远直击事物本身，进入事物的深处。这就是炳辉。

让我们从一起阅读炳辉的一则随笔——《启东：我天地开阔的故乡》开始吧。文章这样写道：

启东与上海隔江相望，直线距离不过几十公里……

这片新生的冲积沙地，以丰饶的水土物产，养育了启东的百万乡亲，也传承了一种吃苦耐劳、探索创新的精神。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如果上溯五代以上，都是远近各地的移民……他们与来自南北各地的人们相处，融合成一种新的区域文化和乡风民俗，也造就了启东人的勤劳朴实的性格、包容开放的心态。所以，对启东人而言，与来自他乡的人们友善相处，或者离乡背井去开辟新的生活，从来都不是什么

新鲜或者为难之事。

在我的记忆中,故乡的天地开阔,空气清新,与那些历史悠久的地方相比,这里的屋舍朴素无华,就像启东人的生活方式一样。虽说也有许多的民间风俗和习惯流传,但无特别而固守的地域文化传统,尤其是占启东大部分的沙地区域。

在我十八岁离乡之后才逐渐发现,启东居民几乎没有喝茶的习俗,从乡镇到县城,也没有什么茶馆酒肆的传统场所……

这也可以从启东的饮食传统中见出一斑来:那些具有所谓启东特色的菜肴,多少都带点老实巴交的脾气。无论是水里的海江河鲜,还是地里的蔬果,上桌时并没有多少精致的形式功夫,也不成什么菜系,当然更没有多少名气了。但鱼是鱼、蟹是蟹、虾是虾、肉是肉,菜是菜,就吃个新鲜和实在。传统的点心与小吃呢,也都是乡下人田间地头可以拢着,水下可以捞起,枝头可以摘下的东西。<sup>①</sup>

炳辉这是在写自己的故乡,又何尝不是在写他自己的追求?写他自己所崇尚的文化、所服膺的品格。

我的“启东老乡”(家母恰好也是启东人)的这段叙述中,最打动我的,就是“鱼是鱼、蟹是蟹、虾是虾、肉是肉,菜是菜”那几句非常熟悉而朴质的话——用方言说出这几句话来,一定会更见出其中情味。

当然,作为一名优秀的比较文学学者,炳辉不可能是丹纳意义上的种族和地理决定论者;但很显然,在他的生命中,也在他的学术中,是其所是、实实在在而不虚张声势、哗众取宠,乃是一种最宝贵的“文化基因”。只是,这种“鱼是鱼、蟹是蟹”的品格,绝不是孤芳自赏、故步自封,更不是文化部落主义的借口。正相反,一个理想的“启东人”,一个始终与海为伴的“启东人”,正像炳辉所说,并无“特别而固守的地域文化传统”,也能“与来自他乡的人们友善相处”。对他们而言,甚至“离乡背井去开辟新的生活,从来都不是什么新鲜或者为难之事”。也就是说,开放而包容,是与捍卫自我的独立与本

色并行不悖的。

多平实的表达,又多么准确地呈现了炳辉的精神底色,一个优秀比较文学学人的精神底色。

## 二

炳辉的学术生涯是从现当代文学起步的,这与他在复旦大学中文系师从两位恩师贾植芳先生和陈思和先生密切相关。而正是因为得到两位恩师的“真传”,他又没有停止在出发的地方,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一直是他的“据点”。在我看来,他收入自选集《视界与方法: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一书的两则专论《贾植芳:人格精神、学术视野及其贡献》《陈思和:作为文学关系研究范畴的“世界性因素”》,就既表明了他的师承、他的“学统”所自,也为我们理解炳辉从当代文学批评和现代文学研究(比如徐志摩、茅盾、王安忆、莫言……研究和评论)“转向”比较文学提供了理论解释。

一方面,他以论述陈思和先生的方式,提示我们注意“中国文学的发展包括文学的当代解释都已经无可争议地处于全球化的格局之中”,因而“它的创造力核心与外国文学的关系就不可能只是被动地接受或单向接受前提下的主体性‘微调’,它已经成为世界文学多元格局中的具有丰富内涵(其本身也是一个多元化的文学构成)一元”<sup>②</sup>。

另一方面,他也以论述贾植芳先生的方式,为我们树立了一个中国比较文学学者乃至一个人文学者的光辉榜样:“在他(贾植芳先生)看来,人文学术不只是一个学问体系,也不只是一个认识论的过程,他的学术展开同时是一种由主体参与其中的文化实践;他的文化学术活动兼及政治经济学、社会学和文学等多个领域,在文学内部他又是从文学创作实践转入学术研究,因此不仅熔铸了创作和研究的双重经验,而且从来就具有兼容古今、涵摄中外,并包雅俗的

① 宋炳辉:《启东:我天地开阔的故乡》,《新民周刊》2023年第35期。

② 宋炳辉:《视界与方法: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第164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

包容、通达的文学观念以及广阔的文学视野。”<sup>①</sup>

在我看来,炳辉也正是在沿着他的老师们的足迹继续前行,并对老师留下的启示和问题,以自己的方式给出应答、延伸和拓展。他在以自己的研究实绩寻求“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同时努力获得“包容、通达的文学观念及广阔的文学视野”。

这里尤其想说的是,他在新近发表的《论汉语翻译文学的多学科视域》讲稿中(请见本刊相关文章),给出的两个中国翻译文学史的重要事实。这两个特别提出的事实,不仅再次彰显了他对中国文学史的熟稔和整体性关注,而且也反映了他敏锐乃至尖锐的当代问题意识。他用雄辩的事实再次告诉我们:孤立的、片面的、反世界主义的文学研究(乃至人文研究),不仅错误可笑,甚至完全无法真正成立。

一个事实关涉到中国文学整体:据《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的统计,自1917至1949年的32年间,全国共出版文学书目13500种,其中翻译书目3894种,年均122种,占比达29%,也就是说,翻译书目在所有出版的文学书籍中占比近三成。这个比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至今基本不变,大致维持在25%到30%之间。与之形成对比的是,2008年的一份统计材料,说据美国的一项相关研究,在美国出版物中,外国文学译本在所有文学出版物中的占比是3%,后来罗切斯特大学的一个研究团队对这个3%又展开进一步研究,结果表明,这个3%的占比,是把外国文学研究著作也计入了。如果仅就外国文学译本而言,占比仅0.7%。

另一个事实,涉及中国现代文学的最重要代表之一——鲁迅:鲁迅的文学活动是从翻译开始到翻译结束,他的绝笔是为一个外国文学的汉语译本作序。他一生介绍了14个国家、100多个作家的200多部作品,以其他方式涉及的外国作家就更多了。鲁迅译介外国文学、外国作家作品的文字数量也非常多,据统计超过250万字,也就是超过他的创作字数。

难怪他要用“汉译‘成风’”来描述“汉语翻译文学成就了新中国文学,锻冶了汉语的现代表达力,也充分体现了汉语新文学的世界性品格”。难怪他要用“转世重生”比喻汉语翻译

文学的“世界性因素”:“汉语翻译文学之意义展开的另一个方向是,它也是世界文学多元谱系的一个重要环节,正是汉语的创造性呈现(即汉语译本),使汉语文学之外的文学,包括西方文学和非西方的文学,得以实现其世界性转世重生,也使中国新文学的发生、发展本身,成为世界文学谱系演化的重要组成部分。”<sup>②</sup>而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对炳辉而言,“翻译就是要撕裂(特定的语言与文化之间的)血肉联系,用另一种语言来表达译者从原文中理解到的意涵”<sup>③</sup>。注意,是“撕裂”,而不仅仅是丝滑地获得“信、达、雅”的结果。

过去我自己常常喜欢说,一个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人,如果不重视翻译和翻译文学,就如同一个画家从来不练习素描、一个书法家从来不临帖一样不堪。读到炳辉的这些文字,我才真正感到我们从翻译文学进入比较文学领域,不仅是一种工具性和学科性的需要,也是我们无法回避的处身并理解世界的前提。中国学人,还有炳辉所说的其他“弱势民族”的学人,也许更为如此吧。

谁能否认呢?我们事实上既是世界的主动“翻译者”,也已经是“被翻译”的学人。作为比较文学学人,甚至更难以摆脱这样的“宿命”。

### 三

在同样收入《视界与方法》一书的《陈众议:学术视野与文化关怀》一文中,炳辉曾提出这样的问题:

我想,文学研究者面对复杂多变、个性各异的作家及其创作,习惯从中寻找一种统一性,认为唯有这样才能体现了研究的价值。由此,便把个性里的矛盾、变化中的差异、分裂同时的并存,一概视为需要处理的对象。但是,为什么非得给矛盾、分裂

① 宋炳辉:《视界与方法: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第128-129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

②③ 宋炳辉:《论汉语翻译文学的多学科视域》,《东吴学术》2024年第6期。



的作家精神倾向找到某种统一性呢？如果矛盾与分裂是事实，那么这样或那样的统一性不都是研究者强加的扭曲吗？<sup>①</sup>

毫无疑问，炳辉对这样的来自“统一性”的扭曲，在方法论上是有非常理性的认识并试图加以规避的。不过，在我看来，最难能可贵的，还是他对“统一性”更进一步的纠偏。也就是说，他不仅努力捍卫文学的多元与复杂，而且还勇敢地怀疑一切“一言以蔽之”的答案。

对克服这更深一层的“统一性”，他在两方面用力最勤。其一，如上文所说，以独特的视角打开世界文学史，悉心进行“弱势民族”文学研究；其二，在理论思考上，格外关注“光谱”或“谱系”，从而随时警惕将自己的研究对象本质化。

先说第一个方面。事实上，一名中国现代文学学者，“贸然”转向研究中东欧、南美文学，不仅阅读而且评论马尔克斯、裴多菲、昆德拉……甚至转到了世界语问题，这种选择，在过于科际分化的学院氛围中，是不免有些“风险”的。人们甚至会提出他所掌握的外语语种是否足够多这样看似合理的问题。这既是“学术规范”，也是一种理想境界，毕竟钱钟书、陈寅恪、奥尔巴赫、库尔提乌斯……已经树立了标杆。

但真要如此“苛求”的话，或许鲁迅就不应该写《摩罗诗力说》，也不应该和他弟弟一道合编《域外小说集》，郑振铎也无法写《世界文学史纲》了。我想，炳辉不会不知道自己在这方面的局限——对于这样艰巨的任务，谁能没有局限呢？他曾至少以两篇文章，即《弱势民族文学的影响接受与中国文学的主体建立——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一个侧面》和《政治东欧与文学东欧：论东欧文学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内在关联》解释了他在很大程度上突破研究“规范”和边界的理由。

说到底，如鲁迅们所早已意识到的那样，我们了解外国文学不能仅仅满足于了解莎士比亚、但丁、歌德、巴尔扎克、卡尔维诺……还需要了解裴多菲、博尔赫斯、索因卡……即使是了解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也不能仅仅知道伍尔夫、乔伊斯、卡夫卡，而不知道布洛赫、约瑟夫·罗特、罗伯特·穆齐尔等。

看到那些可以看到的，固然重要；看到被思想惯性左右还没有看到的，才能更好地避免我们一叶障目、盲人摸象，至少使我们对既有世界文学版图有一个更为充分的观察……这种既打破欧洲中心主义，也打破欧洲之中的西欧中心主义的尝试，毫无疑问，正是我们摆脱既有“统一性”的一个重要实验。这样的愿望，或许会被嘲笑是一种“宏大叙事”；具有这样远大抱负的人，或许也会被误解为“当代堂吉珂德”，但，无可否认，这是一种并不试图给出一劳永逸的答案，却超越单一视角，以瞻望整体文学世界所葆有的可贵好奇心。

更重要的是，我们自认为的主流文学固然与中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处于我们视野盲区的非主流文学也与中国有不可忽视的联系，它们甚至是中国现代主体性建立更为切近的参照系。炳辉这样表达其政治的意义：“相对于现代化先发国家的西方文学而言，弱势民族文学拥有更丰富、更切近的现代民族文化交往——特别是民族与文化间冲突性交往的经验，因为在近代以来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过程中，民族交往和冲突的大部分事件，往往是在这些弱势民族文学和文化的‘本土’展开，而且常常形成生死存亡的紧张局面。”<sup>②</sup>这就更加凸显了从中心看边缘的同时，也更需要从边缘看中心的意义。

#### 四

如果说，上述对“弱势文学”（或非主流文学）的观察，更多地是从空间的角度，扩大了比较文学的世界，是一种横向拓展，那么，炳辉所做的另一方面的尝试，对于“光谱”的强调，则更多是从纵向深入开掘比较文学的世界。

用炳辉所喜欢的说法就是，我们需要更加重视事物构成的“光谱”。这里的所谓“光谱”，有时或称“谱系”，具有某种尼采或福柯的意涵。此处或许暂无法深究，但至少有一点是明确的，它要求我们不仅仅将文学的事实看成一个缺乏层次的扁扁的“平面”，甚至看成一条单一

<sup>①②</sup> 宋炳辉：《视界与方法：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第145、170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

的“线”。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并不是具有“统一性”的,我们对之所做的理解和解释,既取决于对象本身,也同时取决于观察的角度和语境,以及观察主体的不同。

在这方面,最让我感佩的,是炳辉对一些关键概念细致而精微的爬梳。在这里,他又一次展现了“启东人”既吃苦耐劳又善于探索创新的精神本色。

比如,说到中外文学关系研究,我们通常会简单地以“交流”“交通”与“关系”三个词互换。但炳辉在长文《论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主体立场及其方法》一文中则特别提示我们注意三者的微妙区分。不妨摘录如下:

关于中外文化与文学交往史的研究著作,历来有三种命名方式,一种是中外“交通史”,它出现较早,注重文化或者文明交流的史学研究,强调对物质形态的中外文明交往史实的整理研究。而注重文化与文学交往研究的著述多采用其他两种方式命名,即“交流史”和“关系史”……但若从辞义与概念角度看,“交流”与“关系”不仅在释义上有所不同,作为学术概念更包含了不同的意义内涵和方法指向。……比较而言,“交流”侧重事物间关联的事实状态,带有某种客观性意味;“关系”除表述这种事实状态外,更有对这种状态的分析、判断、推理和猜测的成分……在这个意义上,“文学交流”和“文学关系”是两个不尽相同的概念,进一步分析,其在学术话语中的不同理解与阐释,则涉及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立场的确立与方法的探讨。<sup>①</sup>

从这个区分,不仅可以见出炳辉心细如发的学术风格,还可以看出他见微知著的能力,这也正是他提供给我们一个关于“光谱”的有力例证。

这几乎是他的一贯风格。在最近的两篇长文中,他又再次使用这样的“宋氏思维法”。比如,在《论汉语翻译文学的多学科视域》中,关于翻译,他提出了一对分析性概念,即“强对应”和“弱对应”:

所谓强对应,是指译语文本和原语文本之间具有高度对应关系,即在语言表达的各部分(词、句、段落与篇章)的精确对应;相反“弱对应”就是指这种对应关系存在的模糊性、多重性和不确定性。用这一对关系概念对照基本分类下的两种翻译文本,我们可以看到,信息类文本的翻译是强对应的,而文学类的、艺术类的(当然在某种意义上包括有些宗教性文本、哲学性文本,因为对宗教的、哲学的或理论性概念的理解本来也包含了阐释上的多义性)翻译,广义的文学类文本的翻译,其原语和译语之间则是一种弱对应。<sup>②</sup>

又比如,在《世界文学的语义分析及谱系研究的可能性》中,关于如何去本质化地认识“世界文学”,他有如下论述:

我认为,世界文学谱系研究不应企图还原某种既定的确定性谱系,而应努力推源世界文学概念的历史发生,描述和人类语言文化的复数状态相对应的文学观念和认知(自我认知,对他者的认知)的发展历史。世界文学谱系研究的目的在于划界规范,也不是借助横向的分类或纵向的分期来凸显种种既有的边界,更不是构造新的边界,相反,它意在强调边界的模糊性与建构性,意在描述语言、文学与文化在时空中的波浪形关联或树形历史脉络(甚至“波浪”与“树形”比喻也是在多重繁复的、不确定性的意义上才可以对应世界文学的复杂性)。这也是福柯采用尼采的谱系学方法(method of genealogy)以改进其知识考古学的方法论意图所在。世界文学的谱系分析,还应该借助语文学和学术史方法厘清其概念的发生及其与历史语境之间的关系;应当努力呈现世界文学概念在文学与

① 宋炳辉:《视界与方法: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第3-4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

② 宋炳辉:《论汉语翻译文学的多学科视域》,《东吴学术》2024年第6期。



文化演化中的学术建构功能,包括区分其描述现代发生和回溯历史这两种不同的语用方式,因为如果承认世界文学是一种现代发生的文化事件,那么,将这一概念施用于它发生之前的文学现象,实际上是一种以今揣古式的“所指滑动”。作为比较文学的核心概念,世界文学的谱系分析更应该在多元文化的时空中揭示文学的跨文化对话功能,以及一种动态的、面向未来种种可能性的文学/文化创造功能。<sup>①</sup>

这里所讨论的虽然是如何对世界文学概念作谱系分析的问题,但很显然,所有这些论述,都体现了炳辉试图在哲学高度上超越旧有认识论框架,拒绝滞留在“物的世界”,而向“事件”“过程”以及“谱系”奔赴的努力。世界文学是复数的、未完成的,因为世界是复数的、未完成的。

## 五

细心的读者也许看到本文的最开头时就已知道了,这篇读书笔记的题目乃是“戏拟”浦起龙的《读杜心解》。这样做,我当然并不企图

自比山伧先生,炳辉的心性也明显不是沉郁顿挫的杜工部类型。我所偏爱的,是“心解”这个说法,它能更好地表明,这篇阅读札记,不是对炳辉文章与思想的“详注”(仇兆鳌),更不敢是“镜铨”(杨伦)或“臆想”(王嗣奭),而仅仅是一次将心比心、以心论心的对话与解读。这也同时意味着,它是不完善的、未完成的——虽然不是“事件性的”,而是“心灵性的”。一定有不少谬解的成分,请老友海涵。

谨以此阅读笔记,遥祝炳辉兄荣开六秩,永葆“启东人”的品格、心性与才情。余不一一。

**【作者简介】**张辉,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比较文学学会(CCLA)会长,国际比较文学学会(ICLA)执委会委员。曾为香港道风山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哈佛大学访问学者;并在耶鲁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在图宾根大学及澳门大学等校短期任教。主要研究方向:文学与思想史、文学解释学、中德文学与美学关系等。

① 宋炳辉:《世界文学的语义分析及谱系研究的可能性》,《探索与争鸣》2024年第6期。

(上接第15页)如果我们把这个概念再拓展一点的话,还可以涉及中国内部各民族文学之间的互译,当然还包括中国文学的外译。所以,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翻译文学也是一个多元系统。系统性的文化现象本身就需要我们进行跨学科的研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展开有效的翻译文学研究,不是有可能从多学科的路径进入,而是必须从多学科的路径进入。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从多角度去阐发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翻译文学,才能系统地考察它在文化体系中的作用,才能完整地阐释它的文化功能。即便是这个谱系中的个案,也可以、并且需要多学科、多视角地考察。在这个意义上是否可以说,翻译文学或文学翻译是中、外语言文学学科中最具跨学科特性的领域之一,需要研究主体以多

学科的、学科交叉的视角和态度来对待它。

**【作者简介】**宋炳辉,上海外国语大学二级教授,《中国比较文学》主编,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中外文学关系、汉语翻译文学和现代中国文学研究,著有《弱势民族文学在现代中国:以东欧文学为中心》《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中东欧卷》《视界与方法: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徐志摩传》《想象的旅程》等著作十余部,发表中英文论文百余篇。前两者分别获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人文社会科学,2019)和中国国家图书奖(2018)。入选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2014)、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2016),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18)。